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一期 ——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6e)

【史海钩沉】庐山会议余波 (一)

董保存

【口述历史】丁盛口述历史

丁 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庐山会议余波 (一)

• 董保存 •

◇ 毛泽东关注华北

说到华北会议的由来，就必然要说到 1970 年的庐山会议。有研究历史的学者认为，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的延续。这话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没有庐山会议上的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没有那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就不会有华北会议，这是不争的事实。

1970 年 11 月中旬，中央决定在地方的地区一级、部队的师级单位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份红头文件指出：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项目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 1970 年 5 月 9 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

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份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文件，不知何故，直到1971年1月1日，也即华北会议开始后的第18天，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就是这份文件，才使得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得以在更大的层面传达，从而使陈伯达的问题在党内公开。此前，只是在少数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达。

应当说，毛泽东批转这份文件，是他的战略部署中的一环。

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让毛泽东吃了一惊：自己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中央办公厅也早已通知不设国家主席，为什么每个小组都有人跳出来呼吁设立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煽风点火，叶群声色俱厉，吴法宪有根有据，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拿着称“天才”的语录，还有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抢先出笼……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批判了陈伯达。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发言？这其中哪些人是有预谋的，哪些人是被蛊惑上当的，一时还很难判断。他需要看清真相，也需要教育全党。那么，从哪里入手呢？

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使他不能不想到华北，不能不想到北京军区；那么多的军队代表的发言，使他坚定了要抓军队的想法。最后，毛泽东将目光聚焦在了北京军区。

此时，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还不知道最高统帅对自己的误解有多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解释的机会。他不知道毛主席有没有看到他在庐山上写的那封解释信。他相信，如果主席看到了，是会原谅自己的。但毛泽东究竟看到了没有，谁也不清楚。

“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主席，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若干年后，郑维山这样回忆说。

从庐山回京后的郑维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离京前往内蒙古处理那里的军政要事。一直到9月底，毛泽东从庐山转道南方回京时，他还在伊克昭盟检查工作。

那天，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

“郑司令现在哪里？”

杜辛回答：“在伊克昭盟乌审旗。”

“晚饭前能不能赶到北京？”

杜辛回答：“乘飞机可以，我马上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不用了，你告诉他，赶不回来就算了。”

有着政治敏感的杜辛觉得这事不简单，很快报告了出门在外的郑维山，并建议先电话问一下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是否晚上有重要活动，还说由直升机转乘大飞机，下午回到北京应该没有问题。

郑维山当然知道，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果没有事，他是不可能打电话来的。如果有事，就很有可能是主席那里问情况。所以，郑维山很快要通了汪东兴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间：“汪主任，是不是有特别急的事情？如果立即坐小飞机，再转车，明天下午还是能赶回去的。”汪东兴说：“安全重要，不要勉强回来了。”

事实上，是毛泽东的专列路过丰台，要汪东兴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到丰台，

在专列上召见他们。对于这次在丰台的接见，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的回忆是这样的：

毛泽东问：“庐山会议你们传达了没有？”

“传达了。”陈先瑞回答。

“怎么传达的？”

“分片传达的，对陈伯达的问题先下毛毛雨，然后专门讨论。”陈先瑞说。

“我们在市革委会领导小组和卫戍区党委常委中传达了，当时议了一下，还没有讨论。”吴德接着说。

“这个办法好，何必那样急。”毛泽东不动声色。

陈先瑞说的是实情，对于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陈伯达问题的传达情况，北京军区是考虑再三选择了分片传达的办法——各地驻军领导参加当地的传达会议，北京军区领导则由军区组织传达。

庐山会议闭幕后，郑维山与陈先瑞、吴德、解学恭和李雪峰商量有关传达事宜。

陈先瑞说，以往传达会议精神，惯例都是分片传达，这次中央通知的意思也是要低调，我看还是分片传达吧。

李雪峰说，中央有精神，按中央规定传达。陈伯达的历史问题由中央组织成立项目组，我们按中央的部署办吧。

郑维山说，下山前，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传达，中央早就下发通知，有三个要点：首先，传达问题按公报，陈伯达的问题记住多少传达多少；第二，注意保密，除公报外，有关会议文件、复印件和个人记录等一律上交或由秘书销毁，片纸不带；9月6日下午庐山会议总结时，毛主席又说，陈伯达当政治局委员不成了，但是如果没有历史问题，还可以当中央委员嘛。看来，中央对陈伯达的态度是保的。

分片传达完陈伯达问题后，郑维山启程赶往内蒙古。临行前，他告诉主持军区工作的陈先瑞：“把传达情况向中央写个报告。”“我已经请示过黄（永胜）总长，黄总长说不用写报告了。”陈先瑞说。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问题，北京军区不敢怠慢，传达结束后还是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送上去后，上头很快有了反应。中央副主席康生在报告上批示：奇怪？毫无揭发！

这一切，也促成了毛泽东决定在华北地区、北京军区有所动作。

◇ 批转三十八军报告——毛泽东甩出“石头”。

正当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深入思考、对华北组的“六号简报”进行追查的时候，北京军区方面有了反应——12月10日，一份署名“三十八军党委”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毛泽东吸着烟，凝视着手里的文件。可以说，这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份材料。这份报告很突出、很重要的一个基调，是揭发陈伯达在“文革”中，在北京军区、华北地区活动中，突出自己，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报告第一部分，开头就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报告举证说：

1967年12月25日，他参加了北京军区党委全会，用一种奇特的语言讲个别军和个别地方把军队内部矛盾暴露到社会上，谁都能听懂，他是诬指三十八军。军区全委会开了二十多天，矛头一直指向三十八军，逼三十八军同志作检讨。

陈伯达从来不提林副主席。1967年秋、冬，他在首都接见保定赴京代表团和到保定视察时，在公开场合共讲话12次，其中208处提到他自己，17处提到郑维山同志，但却只字不提敬爱的林副主席。1967年12月25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全会上讲话，1969年11月25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的战备会上讲话，有68处宣扬他个人，只有一二处提及林副主席。今年7月，陈伯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内蒙前线……

在军内外讲话8次，闭口不提毛主席的战备指示，根本不提林副主席。

……陈伯达在群众面前，总是宣传他个人的一套，含沙射影地反对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据我们知道，他参加北京军区的几次重要会议，就贩卖了许多私货。

报告第二部分，开头语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1967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

为了举证这个问题，报告在列举了一些会议后说，由于陈伯达的卑鄙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会议后，不少群众和兄弟部队对三十八军产生误解。12月31日，全省10个专区一派群众和部分驻军、军事院校的代表齐集保定，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公开宣传“三十八军是支持全省的反军派”，“要揪出反军派的黑后台”。

1968年1月26日，陈伯达勾结杨成武，在北京军区主持的成立河北省革委会筹备会上，当着全省驻军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暗示三十八军搞“武汉事件”……由于陈伯达恶毒煽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猖狂的逆流，说三十八军是黑线部队。……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讲话当“圣经”，说“解决保定问题，首先要落实陈伯达同志的指示……”

这份报告，在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反党行为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军区负责人在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至于这份报告是怎么出来的，现在说法不一。三十八军的老同志说，是当时他们看了中央的通知后，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写出来的。也有人说，这份报告是江青授意他们写的，要不然怎么能直接到了毛主席那里？还有人说，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转移视线，将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军区而搞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个报告，三十八军的同志上了他们的当，等等。

不管这份报告是怎样出来的，但毛泽东抓住这份报告，把它当成了“石头”，却是历史的事实。

12月16日，毛泽东甩出了这块“石头”。在三十八军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

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当天，周恩来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8名常委于18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18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被“扩大”到会，学习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周恩来神色凝重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对有些地方还重复念了一遍。

郑维山的政治直觉告诉他，自己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上。但他觉得毛主席的批示是建立在不正确情况之上的一一怎么能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皇”呢？

周恩来传达完毛泽东的批示后，浓眉紧锁，沉默地望着北京军区的几位领导人。

郑维山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表态：“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批示。我觉得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再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我相信，事实真相总会查清楚的！”

李雪峰等人也明确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没再多说什么，他告诉众人：“会要有把握开好。当然，军队党是相信的，这么多军队要好好开一个会。”次日，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递到了毛泽东那里。

主席、林副主席：

昨（18日）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华北到会的同志有：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解学恭、肖文玖、吴先恩、张南生、郑三生、尤太忠等九人，北京卫戍区有吴德、吴忠、杨俊生三同志。会上，先发了中央印发的讨论文件（（1970）134号）。读后，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每个师二至三人，军四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党委常委、军分区二至三人，同级军兵种和代管部队、机构亦来相应人数，预计要来四百多人，时间性要长一些。在昨晚讨论中，解学恭、吴德、吴忠、杨俊生等同志都强调主席批示中“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两点。政治局同志也指出：“为何连林副主席也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为何北京军区两次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一次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一次传达中央62号指示）都只是分片传达，为何河北省的两次传达也是那样草率，一次了事，然后由各军、各地零星揭发，而不能集中讨论，追究原因。”经过大家发言，对郑维山、李雪峰两同志有了触动。郑说，过去上当犯错，现在有信心悔改；李说，过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吴先恩同志提议，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19、20、21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北京三人参加，约十五人），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永胜、作鹏两同志也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个推动作用，在会中也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

以上处理，妥否，请主席批示。

光“甩石头”还不够，毛泽东还准备要对军队的领导机关“掺沙子”、“挖墙脚”。现在，他要“掺沙子”了。毛泽东在文件上奋笔疾书：

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的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有深意的。他要黄永胜和李作鹏参加这个会，是想看看他们有怎样的表现。

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交代黄永胜在北京看家，没有去庐山，也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过，他送的书面材料也是写了要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黄永胜、李作鹏已和叶群等人串通过，对他们到底是不是上了“船”是有怀疑的。再者，他们和华北的李雪峰、郑维山是怎样的关系？让他们参加华北会议，不也可以看出来吗？

而深受毛泽东信赖的李德生、纪登奎，在历史上和那些人没有过多关系，要他们在华北会议上充当“沙子”，起到“透气”的作用，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有人猜测，此时毛泽东已有改组北京军区之意，由李德生、纪登奎接替郑维山、李雪峰。虽然这只是猜测，但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 华北会议前期——揭批无力

1970年12月22日，北京的天气特别寒冷。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整整齐齐地坐着449位来自全军高层领导机关和北京军区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以及河北省地（市）委书记以上干部。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华北会议”。按惯例，这次会议也被分为小会、中会和大会。小会只有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中会扩大到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则要求全体人员参加。

一开始，会议气氛就有些紧张。会议规定，所有与会人员一律不许私自外出，有重要事情外出，务必请假。同时规定：“会议要保密，会间不准打电话！”

在此前的几天里，郑维山怀着复杂的心情于19日、20日主持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开好华北会议事宜。20日，北京军区正式接到中央通知，要求全军区正师以上干部和河北省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同日，周恩来约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谈话，商定他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事情。

12月24日，北京军区召开常委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以军委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上。李德生、纪登奎等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黄永胜拖着长腔首先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传达之后，他介绍说：“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按照毛主席的批示，要开一个有广度、有深度、长时间的会议。”

其实，来主持会议的黄永胜，心态是相当复杂的。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庐山上的表现，被毛泽东抓住了，他们相继作了检查，但毛泽东到底怎么看，他们没有底。黄永胜也没有底。这次，毛泽东决定从华北入手，批判陈伯达，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机会。因此，

叶群曾和他们通气，尽量把脏水往陈伯达身上泼，企图瞒天过海。如果能把注意力引到北京军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

与会的400多位代表心情复杂，表现各异。

首先是多数人对这次会议的主题感到茫然：批陈伯达，还是批郑维山、李雪峰？要批他们，怎么个批法？而郑维山、李雪峰还都在位子上坐着。因此，冷眼旁观者有之，唱高调却内容空洞的发言也有之，还有些平时就对李、郑有意见的人开始上下活动，准备材料……

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上层那里。

24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的汇报，将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梳理。最后，政治局形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

12月25日，华北会议召开小会。各小组会议重点是批评郑维山、李雪峰。同日，周恩来就华北会议的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同时，汇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26日，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分别在各小组会上继续发动揭批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同日，周恩来劝大家发言，并说：“如果会议开的无力，中央要点名了。”

12月27日，郑维山和李雪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华北会议的进程。

不久，中央政治局指定四个人帮郑维山写检查，其中包括他的现任秘书杜辛和前任秘书高惠卿，还有军区党委办公室的副科长张工和秘书刘耀。

另外，中央政治局又指定吴德、吴先恩等四个人来“帮助、督促”李雪峰、郑维山端正态度，交代问题。郑维山后来说，当时的“帮李、郑小组”实际上就是搞逼供。

一天，“帮郑小组”要郑维山交代跟陈伯达通电话的内容，郑维山理直气壮地说：“讲的都是一般具体问题，记不清了。同时，电话多数是秘书接的，我接时秘书也在场，要办的事也是通过秘书办的。”他们说：“那不行，交代不了。”

“过去做对了的，要从错的方面去讲，过去认为是正确的，要从错误方面去认识。”几个人告诉郑维山。

“每个问题都要写上动机。”在看了郑维山的一次检查后，“帮郑小组”成员说，“比如‘火烧杨勇’没有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动机，就是要当军区司令。”“比如，那一次陈伯达别有用心地问你：天津核心小组要不要扩大？王曼恬这个人怎么样？你说天津核心小组要扩大的事不知道，王曼恬你还不认识，回去给你问一下。陈伯达连忙说不用不用，你不懂我的意思。后来你去天津时，便向解学恭讲了这件事。动机就是要打击王曼恬革命干部，讨好陈伯达。”

郑维山知道，要想开好会，达到团结的目的，他不作检讨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能给自己

乱戴帽子。

被逼急了，郑维山赌气说：“要检查，我可以作检查，你们怎么写我怎么讲，我一个字不改。但是有两条，你们写上了我也不讲。这两条：一是说聂荣臻元帅是坏人，你写上了我也不讲；二是说华北部队就是‘六字号’的部队，是坏部队，写上了我也不讲！”

郑维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他提到的两条外，真的是别人写什么就讲什么。因此，在华北会议上的检查中，出现了不少违背郑维山本意的内容。于是，郑维山那些早在1968年北京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被提到而未成立的问题，如今都成了事实。此外，又有更多捏造出的新罪名被安在了这员虎将身上。

为了顾全大局，郑维山有许多该上报的材料而没有及时上报。比如，他保存有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谢富治于1967年8月6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可以说清“为什么听任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乱跑乱说”，可是直到华北会议结束后的1971年2月4日，郑维山才把信同其他文件呈给李德生、纪登奎。这封信中说：“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协助，建议在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这封信，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批示“同意”。

其实，在1967年8月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决定，即：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陈伯达与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接触就是从此开始的，在此以前，他与北京军区和郑维山没有多少来往。中央这样分工，就确定了陈伯达对华北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有权作“指示”，而作为担负华北地区“三支两军”主要任务的北京军区，对陈伯达的指示也有组织服从的关系。这是由党的组织纪律决定的。

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活动，实际上只有七次——四次公派开会，两次“周游”，一次自己去“找饭吃”：有一次陈伯达从首钢回京途中，突然到军区要饭吃。有两次是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己去的。陈伯达有着与政治局常委相当甚至超越常委的权力，他到哪里，没有人能说个“不”字。另外四次是“三十八军报告”中所提到的公派会议，由郑维山陪同，也都是奉命行事，不能不从。

在华北会议上，有人提出林彪“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也是郑维山搞的。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1967年12月，陈先瑞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尹明玉，带干事韩殿宾到三十八军了解传达萧华检查的情况，一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周衍盛出面接待。周衍盛原是林彪办公室秘书。传达完文件之后，周衍盛拉尹明玉参加师党委讨论全师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情况。会前，尹明玉、韩殿宾与周衍盛闲聊。周衍盛说曾在林办工作，说三十八军是林带过的老部队，林对这支部队如何如何有感情等等。尹明玉顺口问了一句：“现在军里的干部，林副主席还有无认识的？去看望过林副主席吧？”

就是这样一句问话，引来了黄永胜、吴法宪专程到北京军区找郑维山、陈先瑞谈话，说：“林副主席办公室原秘书周衍盛同志写信给林副主席，检举你们干部部一个叫尹明玉的人调查三十八军与林副主席的来往。周衍盛同志有谈话记录。这是要干什么？要查清楚，严肃处理。”

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军区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黄永胜明确说：“三十八军的问题由办事处负责……”

郑维山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在工作中，他不可能不得罪人。因此，当华北会议对他进行揭批时，自然会有对他有意见的人站出来发言。

28日，发言的火药味浓了些，批评郑维山、李雪峰骄傲自满、刚愎自用。但是，仍没有什么实质问题。

这时，北京卫戍区的一位主要领导清了清嗓子，要求发言。他对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显然不满：“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不老实，你们的要害是跟陈伯达搞阴谋，不讲阴谋活动，这是对抗！……郑维山、李雪峰是陈伯达的打手，陈伯达在庐山向党发难是同打手商量的了！军区常委们都要揭盖子，不要捂。”一时间，全场哗然。不少人震惊地看着他，也有人用眼睛的余光瞄向郑维山，还有的人低头不语，更多的是在交头接耳。

会议基调一下子升温。

于是，在随后几天的小会上，甚至在包括省、市、军以上干部参加的中会上，会议的调子高了八度。很多人把在会上发言当作向党表忠心的机会，纷纷向郑维山、李雪峰发难。

但是，除了少数几个，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要黄、吴、李、邱参加华北会议的真正目的，因此，会议仍显揭批无力。在郑维山眼里，有的人是真批，但是没有内容；有的人是假批，实际是应付；多数的人不发言；还有少数人，在会议宣布问题之后就病了，或者离开了或者住院了，而在座者无不神情紧张。在400多位军队干部面前，他俩仍然表现出首长的姿态。

郑维山至此还没有意识到华北会议对于他命运的转折性意义。他觉得，黄永胜等人像在北京军区第十二次会议上一样，又在小题大做罢了。

◇ 会议转折点——江青到会点火

1970年12月30日，身穿绿军装，戴黑边眼镜，短发齐耳的江青走进了华北会议的会场。这天正在召开所谓的小会——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代组长，她的到来，使会议的气氛顿时有几分紧张。

江青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会场上的人，问：“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有人向她解释说，这是小会，还有中会、大会。

她说：“开什么小会？最小也要开中会。”

于是，这天的中会变成了中会，军区的军以上干部参加。

江青先是不动声色地听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三十八军副政委邢泽等人的发言。同时，她也不忘观察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这几员“陈伯达的大将”的表现——这大概也有毛泽东的意思。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林彪指示召开北京军区党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江青就到军区来参加过会议，和郑维山有过交锋。而这一次与会的人数比上次更多，规模更大。

江青以毛泽东批示的三十八军报告开头，向郑维山打横炮：“我首先向同志们讲一下，我对于三十八军任何人不认识，但我正是为三十八军受了陈伯达这个大坏蛋的气（而来）了。三十八军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写信，曾经想见我，说见肖力也好，陈伯达为这个就压迫我。我想查这个人查不到，现在这个人查到了！”江青以胜利的神情环顾四周：“三十八军到的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叫宋伟的啊？”

三十八军军长刘海清站起来回答：“知道，是我们一个团的副政委。”另一个人补充道：“他在中央文革机关工作过。”

江青满意了，因为她觉得三十八军的人已经站在她的一边了。她接着说：“他的材料证明他在那里完全是受排挤的。我和康老、春桥、文元是被架空的。我建议要宋伟同志到会来揭发！”

响应江青建议的是热烈的掌声。

粗中有细的郑维山已经听出，江青开头讲是为“三十八军受了陈伯达这个大坏蛋的气”，后面就开始诉自己的苦了：

“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要打断我的脊梁骨！打嘛，我也可以打断你的脊梁骨。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傅崇碧冲进去，是由陈伯达秘书王保春勾结进去的。北京卫戍区对这件事还没有个表态。请问卫戍区司令，还有总参，有没有这个职责呢？”

“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带了两部车子，去的都是干部。傅崇碧那个秘书还拿皮包打我。他装昏倒，躺下以后还拿眼睛看我。他昏倒，还拿皮包打我。”

说着，江青站起来，模仿了当时的昏倒情况。

江青比划完，坐下来发号施令：“卫戍区对这几个要查，其中有一个周树青，还有邵崇永，你们一直没有把这些人当回事。这个事大概跟北京军区可能有点什么关系吧！邵崇永有个检查说，傅崇碧说过：不在于江青同志批评我，在于江青同志有察觉。察觉到什么？还不是察觉到他们的活动。这跟陈伯达都有联系的。傅崇碧冲了中央文革以后，杨成武就装病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江青吸了一口气，又指出一个“坏人”：“还有个江枫。”突然，她口气一转：“×××、王曼恬同志他们立了功，特别是王曼恬同志。”

王曼恬会意地迎接过江青投过来的目光。江青谈锋正健：“江枫、王亢之、李树夫完全给陈伯达做特务的。三十八军在北京市公安局有个支左的。”

江青提到的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天津市委的领导干部。当初他们被群众揪斗，成了坏人，陈伯达保过他们。

对于三十八军的情况，刘海清当然最清楚，他及时补充：“是我们副军长牟立善同志。”

“这个人被陈伯达赶走了。宋伟现在在不在？”江青伸长了脖子，目光在会场中来回扫视。

又是刘海清回答：“在。”

江青显然想立即让这位给自己写信的人站出来，又问：“在哪里？”

刘海清：“在保定。”

江青有点失望：“代我告诉他，我没有见他，不是我怕陈伯达，是我遵守纪律！”

接下来，江青便集中火力开始“炮打”郑维山——

“战友文工团简直是军队打、砸、抢的祖宗。郑维山同志你说老实话，王××（北京军区文工团吹小号的）上庐山前给我的两份报告，那么处理，那还不是‘五一六’！抢人家的机密，党的机密。王××，还有个吹小号的，这还不是你们组织的。你这个战友可了不得。我是提个问题你们考虑，有的还会揭发。王××这个人轻易处理，不追查，他是有组织的，他的行动是有训练的。在怀仁堂我要打电话给总理，他就把电话占上了，我都打不成电话。几次打、砸、抢都有他。我觉得郑维山同志对这些问题是很不认真对待的。是否你当时也参加了？当时有人说，北京军区有七个军，陈伯达他辖七个军，还不是太上皇？！”

“这几年，为军队我受小人的气，大阴谋家的气。陈伯达提出了个口号‘揪小爬虫’，他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什么小小老百姓？他才是个小爬虫呢！他是小小小小爬虫，他是王八蛋、两面派。六八年以后他对我就是一面派了，他勾结人整我、压我。这些问题卫戍区、总参不追究。你们不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吗？为什么不追究，我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批评我。”

江青已经开始骂人了，她的怨气发泄了不少。

接着，她的语气稍有缓和，一副中央领导的姿态，鼓动道：“发言不要照本念，有什么就揭什么，揭得越彻底解决得越好，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团结起来。”

江青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也不用稿子。她点着桌子，对李雪峰说：“李雪峰同志，你在北大时我们到北大，你说奉陪到底。你说：你们来我奉陪到底。把林副主席请去了，你不负责警卫，躲到角落里去了，几乎出了事。你是主体嘛，不是客体。北大是你的天下了？聂元梓则给我写了保证，这次到庐山又反对我们了，跟着你走了。最后两年又给我写信，说她又犯了错误。也没说什么错误，大概是对八三四一部的吧？我叫老汪同志处理了。这和你没有关系？在天安门上我就说：你太不像样子了。我保了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要奉陪我们到底，现在我要奉陪你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认错不认错！”

李雪峰低头不与江青争辩。

“你们《河北日报》把黄永胜同志的名字勾掉，印了杨成武、萧华的照片，我请总理、康老和你谈过这是错误的，你是怎么对待的？”

江青越说越歇斯底里了：“你们打我，姚文元同志可以作证。你们打我，这样恶劣，你们奉陪到底，就是在北大！在庐山你们那样干，那样跟着陈伯达干，陈伯达是你们的太上老子！”

江青一副要站起来的样子。郑维山的不满神情写在了脸上：“你一个主席夫人，怎么有那么多人敢打你呢？真是天大的笑话。”

看到郑维山的眼神，江青来了气，喊道：“郑维山你好好想一想，你在晋东南要开枪权、扫荡权，我要不讲可能几万人就完了。”

说到这里，江青被郑维山的愤怒眼神震慑住了，赶紧补充：“我今天来参加会，请示了政治局，请示了总理，我不代表任何人，我也可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我说的那是晋东南，你敢不敢承认？”江青有些气急败坏，站起身，用手撑住桌子，俯向郑维山座位的方向。

一如她所料，郑维山不再沉默，又开始顶了。郑维山理直气壮地迎着她的目光，说：“我已经承认了！”

是啊，几年前，江青就断章取义将发生在郑维山身上的两件事拼凑在一起，弄出个所谓的向她要“开枪权、扫荡权”。郑维山当时就顶了她，说：“我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然而，本不在场的、根本不知情的谢富治、吴法宪却出来作假证：“你说过，我们证明。”郑维山以不言代答，这便成了莫须有的问题。

江青开始向其他与会者描述这件事。在这件事情上，江青是强势，她有发言权，郑维山只能听着。

“当时在人大会议，我遭到突然袭击，进来一批人，拿来一张图，要开枪权、扫荡权，怎么能够这样？！我当时还说，可以挖坑道，派装甲车、坦克去宣传，部队可以放在后面壮声威。当时还有人挖苦我，说江青同志还会打仗？我跟主席几十年，总懂得一点嘛！法宪、叶群可以作证。总理劝了你才制止。后来派了曹中南解决了。我认为那天你们是搞突然袭击，你和我坐在对面，那位置我是永远记得的，我很惊讶！”

显然，江青对于事情的细枝末节永远比事情本身记得更清楚些。她提到的事情也大多是由于当事人一不小心“冒犯”了她。

“还有一件，肖望东从南京军区调来北京当文化部长，带来不少武器。一个文职官员，带了那么多武器，听说藏在北京军区，你查了吗？”

又提起了这件事——这是在北京军区第十二次会议上江青报复郑维山的一个重要砝码，那时就已经将事情说得很清楚了，江青如今仍在翻旧账。

郑维山管不了太多了，既然江青问，就不能装聋作哑：“有个报告！”——江青也知道，郑维山当时把报告打给了中央。

江青故意要让与会人员觉得是郑维山的错，步步紧逼地说：“我没看到啊！肖望东两次被捕。”

江青转向大众：“我看了你们的简报，会议还漂在表面上，很不深入。我看不要照稿子念，说错了也不要紧；不要怕人家抓小辫子，要抓大辫子；要有针对性，不要怕。有毛主席、林副主席作主。”

说了这么多话，江青有点乏了，她收住话锋，示意别人发言。

◇ 江青泼脏水——郑维山想见毛主席

驻天津××军军长简单讲了讲。他当然是从××军的角度找郑维山的毛病，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想出这样的线索：“郑维山同志曾经问解学恭同志，××军是不是和江枫有矛盾？王曼恬这个人怎么样？”。

江青按捺不住，又插话了：“你们军也是倒了霉的，也是叫陈伯达搞乱的，后来才好。我是称赞××军的嘛，依靠××军把这些坏人端出来的嘛。”

她指示××军军长：“这个江枫，你们要好好搞一下，这个人不简单。江枫是陈伯达命令他去的，后来我们端出来了，陈伯达面无人色。我们是背着他的，如果告诉他就坏了。解学恭同志要给江枫成立个专案组。”

解学恭立即回答：“已经成立了。”

江青又停下来，下面是王曼恬发言。

王曼恬发言之后，江青又开始讲话了，显然是针对郑维山：“我和王曼恬就是这么个关系。郑维山你要查就查吧！先查我，再查她与主席的关系。好大的胆子，查到主席身上来了。你们有别的后台！”

对于江青的这句话，郑维山不免出了一身冷汗。

“六八年端出个江枫，陈伯达是不赞成的。当时很多同志下不了决心，怕影响你们革委会，是我下的决心。陈伯达很狡猾，他仇恨革命，仇恨主席，仇恨我。”

郑维山对江青的语言逻辑不免产生怀疑。

江青接着说：“王曼恬揪出了陈伯达的几个心腹，当然他恨她。还有一个人在你们天津叫何其君，是陈伯达鬼老婆的什么人，自杀了，抹脖子了。谁知道自杀还是被杀。别看自杀，线索还要追。”

××军军长发挥说：“郑维山、李雪峰、陈伯达在天津和李树夫谈过。”

江青眼睛发亮。她身上演员的艺术细胞发挥了作用，立即演绎道：“订攻守同盟嘛！”

大多数人的思维已经跟不上江青跳跃的思维了。

江青却仍然信口开河，又转向李雪峰：“郑维山的太上皇还有王力，是个小太上皇。河北省成立革委会，为什么非要结合杨一辰？你说是王力推荐的，那王力是你的太上皇了。这个人是叛徒集团的。”

“生气的事可多了。保定有个胶片厂，非常贵重的东西，一个手榴弹就可以全部炸毁。我要军管，后来三十八军军管了。这下可糟糕了，整天打，还要打江青。这一点郑维山你是有责任的！”江青怒视郑维山。

刘海清接话：“总理让派一个营，进不去，郑维山、陈先瑞不让派。”事实上，这是周恩来

另有指示，这支部队由卫戍区派，没有让北京军区派。

“在碰头会上，陈伯达对我说，你就是三十八军的口吻。三十八军我不认识一个人，河北省军区我也不认识一个人，我就认识一个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身边有4个工作人员，他们老家在河北。他们不敢告诉我千里堤都快决堤了，以后我才知道。”

“还有一件事，李雪峰成立革命委员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还有省军区。这里面有什么鬼？搬家后发了那么多枪。这个问题一定要交代，你们是不是想躲到后面去，让别人打，把三十八军打烂？是不是让坏人冲到北京？我们看你们有这个战略思想，反动的战略思想，这个要交代。”

“现在我想起来了，你们成立革委会，搬了家，发了枪。原来听说五千多支，现在是一万多支，为的是打三十八军，搞乱北京，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我看办不到！”江青用了她声音的高声部，走了调。

“陈伯达六七年要挟主席，不辞而别，后来走了，给我留一封信，就是在京西宾馆，就有你郑维山陪着。”

“这几年我可受尽大阴谋家、小人陈伯达的气了。”

“你是大根据地，是反革命根据地！”江青怒视郑维山。

郑维山迎住江青的目光，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江青移开视线，气更大了：“你这个河北可不得了，保定的问题我愤怒极了。我愤怒是应该的。你们不珍惜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是珍惜你们自己的权。权是人民的，是党的。你们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脱离了人民，就会成军阀。我看会议看看日本的片子《军阀》。东条英机你们知道吗？他是侵略我们的大战犯，这样的电影应该看，北京军区是不是要走上那条道路，这是很危险的。自觉不自觉跟着陈伯达走，也可能是自觉的，特别是郑维山、李雪峰！”

会后，江青真的为参加华北会议的全体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安排放映了影片《军阀》，拿东条英机与郑维山、李雪峰相比。

“我看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很不像样子。你们搬家，我看是有计划的，发枪就是要打三十八军。我并不认识三十八军，这是替党和人民说话。”

“保定离天津这么近，天津为什么叫天津卫呢？因为它是北京大门，保定胶片厂打得那么厉害，口号就是打我。三十八军也进不去嘛！”

“郑维山，主席一再保你，可是你不跟主席走，跟陈伯达走。这一点我要告诉同志们，主席保了郑维山好多次，保了李雪峰好多次。你们不感谢主席，反而跟着反党分子陈伯达攻击主席，攻击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定是不管的啊，省革委会搬走，我看是同坏人弄到北京来，这是你们反动战略的目的，这个要交代！”

在北京军区十二次会议上，江青带头批判郑维山，只是说他有“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而如今，他们找到了“华北山头主义”的目的——跟着陈伯达反党、反毛主席。如果有了这样

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华北山头主义”就顺理成章了。江青的这个“天才”的推断不仅使自己心情激动，更让一旁的黄永胜、李作鹏暗暗高兴。黄永胜本来一肚子心事，知道主席对自己的检查不满，庐山上事还没有了，他也不愿多说话。现在，有了江青给郑维山上纲上线，这不正是他们想找而不得的替罪羊吗？！他们尽量把浑水往陈伯达身上泼，可是，现在，他想到，把浑水泼到郑维山身上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黄永胜暗下决心，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要重提北京军区十二次会议上郑维山搞“华北山头主义”、排挤三十八军的内容。

黄永胜为人老辣，虽然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却以赞赏鼓励的眼神，促使这个神经质的江青像上了发条一样，兴奋地讲下去——

“主席保了你好多次，有一次照相，主席叫我找你，可是你不感谢，你辜负了毛主席。郑维山你好好检讨。我觉得郑维山还是可以改正的，最无动于衷的是李雪峰。他还在埋头记，你记好了，将来翻案可以整我！”

江青说到这里，郑维山既委屈又难过。委屈的是，江青蛮不讲理，向他泼了那么多脏水；难过的是，想和毛主席面对面地解释他在庐山上的情况，把毛主席的怀疑全部澄清，现在想见一下毛主席，真比登天！

◇ 江青扣帽子——郑维山骂娘

江青的思路已经跳向别处：“……六六年十月，他们搞打砸抢，乱了我们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们——郑维山、李雪峰，恰恰支持这群王八蛋！《红旗》是个独立王国，总编辑、副总编辑都是大坏蛋，以后主席就不叫他管了，让姚文元去管，他恨透了主席。他对主席没有办法就恨我，恨姚文元同志。郑维山、李雪峰你们支持的就是这群王八蛋。陈伯达这个大坏蛋，他可能是苏修特务，他和王明一块的。他自己说：‘你们可不要说我给苏修当特务。’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在庐山，我受了一天的围攻，我参加华东组。我是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我讲的很多话都是主席的，当然讲的不完全，有的不是原话。后来就点名了，华北组点了康生的名，华东组点了张春桥。他们要抓人了。李雪峰，就是你，你那份简报引起的，你叫你的秘书干的，你抢先发简报。有几个人签名啊？”

江青巧舌如簧，郑维山已经不止一次领教了，如今，对于江青的表演他只是觉得蔑视，无动于衷。

解学恭小声回答：“3个人。我、李雪峰、吴德。”

这时，江青死死地望着李雪峰，问：“你怎么抢先发简报？”

李雪峰不说话。他心想，都说了多少遍了，这件事情要问汪东兴，但是这种对汪东兴不利的话，他不愿意当着这么多人说。

江青也不追究，继续说：“我听说王猛同志病了，住院。哪位同志代我问候？我并不认识他。当时我听说的，是陈伯达、杨成武商量好的，要把李光军、王猛调走。还有谁我记不得了……”

“要徐信同志去当军长。徐信来了吗？”说着，江青抬头扫视会场。

六十三军军长徐信站起来答道：“来了。”

江青的语气里隐隐地包含着拉拢的意思：“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讲一个军主要负责干部说错了话，可是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为什么呢？这个事要揭开这个谜，靠郑维山。主席、林副主席会给你出路的。”

郑维山暗自揣摩：调徐信的事情，最开始不是也说是我的错吗？江青突然不提我，说成是陈伯达和杨成武商量好的，她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嘛？！

“李雪峰是摇鹅毛扇子的。保你好几次了，你无动于衷。”

“受气的同志，现在要翻身了，翻了身就容易翘尾巴，三十八军的同志要注意。我是不认识三十八军的，我是为了三十八军受气来啦！陈伯达？我好几次。我要求三十八军不要因为翻了身了，骄傲起来了，打个预防针。”

她顺手将一缕落到脸颊的头发别在耳后，漫无目的地望向会场上空：“陈伯达怎么出去的呢？要挟主席，不辞而别，就是在京西宾馆。”

“在华北组的简报上，有陈伯达的发言。陈伯达的发言，一个记录本，主席逼着他交出来，那是陈伯达反党啊！主席给了我，我送给了康老、总理。”

“主席要我们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不然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这是《我的一点意见》里讲的。不要畏难，我已攻读4本，我就要读，为主席争口气。我已读了《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最后读老祖宗的《资本论》。不要上人家的当，听人家说马列的书难读就不读了，主席的书难读就不读了。我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很不相称。你们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大军区、省军区、军的负责人，要懂得一点马列主义，必须精通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才能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你郑维山就是不学无术。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保你几次了，主席保你多次了。”

论打仗，郑维山擅长，但论理论水平，郑维山认为自己确实不是很高，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不学无术”。

江青见郑维山脸上难过的表情，更来了精神：“就是那份简报，要不是主席果断，差一点分裂了党。实质上是在北京准备的，哪里是在庐山搞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二中全会前就搞了，上山就是要分裂党，就是针对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的前身是红军，红军的缔造者是谁呢？毛泽东！”

“‘三八作风’头一句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路线。郑维山你读了吗？陈伯达是刘邓路线的，最初是王明的人，吹捧他是‘大理论家’。这个‘理论家’，我接触他四五年，可厉害啦，经常吵架，贪生怕死。为什么他这样呢？在庐山有人说怕他自杀，我说，我观察了他几年，不会。他很神气，为什么神气呢？因为有你郑维山、李雪峰同志支持，有华北做后盾。现在我还称你们同志，就是因为你们还有机会交代，主席的批示是给你们出路的。你们是群众攻

一点交代一点，你们要彻底交代。”

一时间，群众们“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了。对于江青一方面将自己的问题定性，一方面又申明主席给自己出路的做法，郑维山很是恼火。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感到很突然，我看他们事前有准备，郑维山、李雪峰同志要好好交代。这份简报是很不简单的，一早就交给了我，华东组也轰动了，点名要捉人，点了康生的名，张春桥的名，我没有参加宪法修改组，我要参加了，就要捉我。他们利用了广大党员对主席的热爱，好多人是上了当啦。郑维山、李雪峰同志我看不是上当的问题，你看二中全会前在华北那样搞。”

“娘的，给定性成敌我矛盾了！”郑维山暗骂。

“我声明我那里的文件有人抢，由卫戍区负责，管不管是你们的事，我住的地方有好多人爬过，还抓了几个，后来总理、林副主席去了，派了岗哨。”

“温玉成也不好，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对‘五一六’这么一个组织，不了了之。”

“你们卫戍区应该搞清，打我不是你们指使。你们应该把好几个人追回来，让他们交代，查清。不查清你们欠了一笔债，欠人民的，欠革命的债，不是欠我个人的！”

江青停了下来，王曼恬继续揭批。当她谈到文艺系统抓五一六问题时，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江青又插话了：“……金敬迈是五一六，他们在东北搞陈锡联，是打我的。你们对这些人亲，对我们疏，有时有敌视的味道。郑维山你要好好想一想，1967年冬，我见你，当时我并不认识你，保了你，当然也是为了保全军，这是应该的。金敬迈差一天就跑了，我们就抓不住了，是我告诉你。”说着，江青用手指向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心里有事，望着江青，连连点头。

江青接着说下去：“派了一架飞机，从广州抓来的。金敬迈有交代口供。火烧英代办是傅崇碧布置的，北图事件是整我、总理、康老。午门会议是布置烧英代办的。大家知道一点，七凑八凑就搞清楚了，可是现在还都浮在面上。”

“叫宋伟来揭，不要怕嘛，有主席给我做主！”

宋伟毕竟没有来，于是也就没有人应江青的话。会议的调子却是定下了。

这一天的江青春风得意，讲了两个小时，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次讲话，江青给郑维山扣上这样几顶帽子：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破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是陈伯达反林彪的武将。搞华北山头，是聂荣臻在华北山头的继承人和代理人，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华北这个山头还有一套反动的战略计划，这个反动计划就是打烂三十八军，搞乱保定，开放一条路，让坏人冲进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北京军区是要走东条英机的道路。

江青还嫌讲得不够，最后竟然把他们自己制造的“二月兵变”、围攻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还有什么“午门会议”、“北图事件”、“七分钟的闪电”等等，一股脑地和这个华北会议联系起来，干脆把北京军区说成是一块反革命根据地。“杨、余、傅”事件时郑维山是聂荣臻山头主义

的代言人。华北会议以后因陈伯达的问题出来，郑维山就是跟陈伯达反林彪，把陈伯达封为北京军区的太上皇。说什么所谓搞突然袭击，要开枪权、扫荡权，下令开枪，在磁县造成流血事件……

◇ 会议高潮——江青打横炮

当197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京西宾馆里却没有多少新年的气氛。这里的批判斗争已经开始升温，郑维山、李雪峰等人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他们被告知，要“闭门思过”，深刻检讨，不得离开京西宾馆。

他们不知道，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周恩来在时时关注着这里的情况。

就在元旦这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分别告诉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要他们两三日内将华北会议开会经过和揭发陈伯达等人的情况作一系列报告送阅。

他们的报告还没有送上去。1月3日，江青见仍揭不出什么实质问题，再次来到京西宾馆。

从某种意义上讲，江青确实具有几分演员的素质。她上次来这里讲话，确实使会议“升温”了——批郑维山、李雪峰不能浮在表面，要揭出深层的问题。而什么才算深层次问题呢？跟着陈伯达反党才是最深的层次。

而且，两年前茅内不是批过郑维山搞华北山头主义嘛！那时候搞华北山头主义不成立，主要还是因为人们找不出郑维山那样搞的政治目的，但是现在，如果郑维山跟着陈伯达反党，郑维山有了政治目的，那么，他搞华北山头主义不也就成立了吗？

江青走进会场时，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正在发言。

她的到来，不能不引起会场骚动。她的地位使得人们不得不重视她的存在。几个工作人员忙碌着把她安顿好。她摆摆手示意继续开会。

当刘子厚讲到，江青上次来讲话，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具体化了。江青忍不住说话了：“我插一句话。我不是代表主席的，是代表我个人。我还没见到主席，我是请示了总理来的。我听了忍不住才讲的。如果我讲错了，同志们可以批评，讲对了可以采纳。不要认为我说一句话是代表主席的。叶群同志代表林副主席没有，我不清楚。我没有。我连面也没见过主席，在你们这开了会，第二天才见了主席，不要以为我讲了就是代表主席、代表林副主席的。如果代表主席，我就记录下来拿来念了。我个人的意见，如果错了可以批评，如果对了，我坚持到底。”

刘子厚继续讲下去……

当刘子厚谈到陈伯达打着中央文革旗号四处活动时，江青又抢过话头：“他的画皮！中央文革这张画皮实际他早就不要了，他打着旗号，他说他是中央常委，是太上皇就是了！”

刘子厚坐下，同时用眼睛的余光观察江青的表情，他感到，自己的揭批还不够深入，江青对自己的发言并不满意。

接下来，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发言。张正光讲到北京军区文工团抓萧华、抓杨勇、关郑维山的一些情况，江青听不下去了，开口说道：“哪个说中央文革开了会？你又讲杨勇，又讲郑

维山，我就不叫你讲了！”她皱紧眉头对张正光说：“当时是怕北京军区大乱。”

张正光低下头，只好改变话题。

谁知江青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应该把王××、吹小号的，还有一个……”她低下头，一时想不起名字。“应该找回来重新审查。还有个叫章亦敏（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一个叫石仰天（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看看章亦敏的档案就知道是特务。石仰天这个王八蛋公开反对我，反对我也不要紧，但他是不对的，他是北京军区的吧？还有一个丁莱夫，石仰天就是和丁莱夫起来要翻案的嘛！”

“我听说这几个人还在大摇大摆的，”说到这里江青动了气，指着郑维山，说，“郑维山，是不是这样？对这样的人根本没人管！”

郑维山刚想回答，没等说话，江青已转向王曼恬：“王曼恬，你起来说！”

话音未落，王曼恬站起身：“章亦敏原在北京军区组织专案组，没搞出问题，结果解散了。样板团要批斗他，把他领章、帽徽扒掉才能批斗，说明北京军区没人管，后来逮捕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向众人说：“有一个文艺战士讲，章亦敏，还有个什么玩艺儿，康义，都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呢。”

（未完待续）

~~~~~

【口述历史】

丁盛口述历史

• 丁 盛 •

◇ “九一三”事件后的广州军区

“九一三”一大早，周恩来总理给我电话，说是“庐山会议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逃跑！”就是林彪，带着他的老婆叶群，他的儿子什么的，逃跑了！这是周恩来给我讲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广州部队的信任。

周总理给我几条指示：

第一、广州陆、海、空归你直接指挥！

第二、直接听毛主席和我的指挥！

第三、广州地区要稳定，部队要稳定，政府要稳定，所有的都要稳定。

第四、加强边防，不能跑人。

第五、立即进入指挥所。

第六、监听敌台广播，注意敌人动向。

当时林彪逃跑，他在温都尔汗摔死都还不知道！不知道啊，当时，就是看林彪这么逃跑，外国有什么反应？

周总理给我这个电话之后，我就找到刘兴元、任思忠，我说：“总理告诉了我了，林彪逃跑了。军区的全体领导同志，立即开常委会，在留园，在留园我们党委办公室开会，这是可以查的。当时决定，我们完全拥护主席、总理的指示，我们坚决听主席、总理的指挥。并且立即发电报给中央。我们备战，一下子就进入指挥所，机关都不知道，其它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出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就是通知机关，不允许休息，备战！很紧！

当时就是这样，我听他们讲，这个电报当时搞得苦啊！我们的机要局长魏继烈，他是局长，不大译了，搞得时间长一点，硬是追他，为什么搞得那么晚？时间搞得那么长？追得不得了，这次非得他亲自译不可，这可以查，电报有原稿，中央也会有电报的，档案可以查！

这是第一，我们表态。

第二呢，传达之后，广州地区的部队、地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不是因为林彪逃跑了，广州地区的部队动乱哪，或是怎么样哪！没有这个事情！很稳定！

国庆节没过几天，李先念和华国锋就来了，到广州来了，后来他给我讲，他们认为广州肯定是很乱，他一看，哎，没有什么事嘛！很平静嘛！所以李先念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要我们注意什么事情，对那些人的子女，不要动他们！不要牵连他们，李先念呢，他们就想这么个问题！按总理的指示办事情。所以广州军区没有发生什么逃跑呀，自杀呀，还是搞其他什么，没有啊！如果按照那种想法，我们都是林彪的人，那还会不出事情吗？

那么林彪南逃你们知道！搞啊！我那个秘书陈宏康抓起来，还有其它一些人，许世友找他们谈话，找李维英（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谈话，说你李维英有本事，有能力，只要你把这个问题揭出来，你就可以怎么样重用，就是封官许愿！李维英讲：“许司令，我不能当着毛主席的面说假话，我就是不知道林彪要南逃！我不知道”。找作战部长王玉振喝茅台：“你们把问题揭出来，怎么怎么的，林彪南逃，只要你们谁说一句，‘我们知道林彪南逃’就行了”。这些人是久经考验的人，他们不会无中生有！他们实实在在，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情，不知道。“你作战部长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受牵连！“丁盛知道啊？”“丁盛不知道！”那时候的电话，查呀，说邱会作给我打电话，我说：“没有！”“九一三”之前，邱会作老婆是给我打过电话，那时候我有病，是问候我，说：“你的病怎么样啊？”说的我的身体，根本没有谈任何的其它的事情。

在广州搞了两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是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江燮元、黄荣海，这些同志是非常忠诚老实拥护毛泽东，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不是为林彪革命，是为劳苦人民革命，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人。隔离起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多人的大会，副参谋长刘如，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赵国楠，要打倒他们。说是丁盛不接电话不知道，丁盛的秘书知道，陈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事对广东，中央虽然没有下正式的什么结论，但是在广州搞的这些事情，影响很大，对广州这部分干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负担！

.....

我在南京工作时，七四年的八月份，在北京开会，当时主持会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总理他们都没有来，主席那就更不说了！我们九个人作检讨，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曾思玉、我、陈先瑞，刘兴元都作检讨，对林彪思想上的认识，都作检讨。这个期间，张春桥、王洪文硬追我，说“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不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几个吵起来！张春桥说：“林彪南逃，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上海，为什么只打上海，就没有广州？”我说：“这电话又不是我打的，电话总机在北京，你问他们，你问我干什么？”

.....

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说：“丁盛不能下来”，这个，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有记录，有材料。怎么办呢？在北京，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我不知道，张春桥的作风，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讲话也凶，王洪文看着总下不了台，就说：“你不知道，以后再说！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贼船”。

从思想上讲，我们对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思想上确实很佩服，尊重，也很崇拜。但是我们没有和他搞任何的阴谋诡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讲了，我和林彪见面就这么几次！话就这么多。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来往。通信都没有。我怎么成了林彪的死党呢？

我说好吧，咱们就作妥协，这个可以的，但是我没有和他搞阴谋诡计。“你要写上”。我说：“写上就写上”！

这是七四年八月检讨，我们这九个人的检讨，各种各样的检讨！现在来看，不该屈服，不该写，我否定，我上什么贼船啊？

三番五次地搞广州军区，说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嗨！那七四年搞得凶啊。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林彪要南逃，我们从东莞订了几吨重的鞭炮，准备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二十七层的广州宾馆楼顶上，从顶上挂到地下，准备欢迎的！军以上的干部，都在广州开会，准备欢迎的。我们军以上的干部是办学习班，读书，读那三十本书。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是可以查的，是宣传部搞的。

.....

又说：“为什么卜占亚的老婆到广州来？”我说：“她到广州来我都不知道！后来问她，她说是来广州学习接待外宾，接待客人哪，她是找他们地方政府的，我根本不知道卜占亚老婆到广州来，我怎么知道啊？”

林立果在广州住了半年，我们广州军区的领导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他也没有到我们大院里面来，这可以查的。我们跟他没有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白云山我们也不知道。这可以查，我们没见过林立果，我也不认识林立果，这可以查呀。所以这一段，我很气愤。

.....

我今天有责任说，我当时是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司令，刘兴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们都是政委、副政委，还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我向中央负责，向全国人民负责！广州军区领导就是不知道林彪南逃。你们搞了这样多的大的运动，翻箱倒柜。七四年、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搞得这么厉害，你们搞到什么证据没有啊？没有任何证据。这样多的人有人知道没有啊？领导者没人知道，有人说他知道，后来他又翻供了，他说他不知道，他是逼的。那么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我今天郑重声明：不知道！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他到哪儿知道啊？没有嘛！

至于林立果，他写的那个“五七一”纪要，他提到说什么广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写的，关我们什么事？他爱怎么写，他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啊？哪有这道理，哪有这个逻辑啊？你们查来查去，查这么多，都毫无根据，硬是把这黑锅扣在广州军区领导头上。当时全国十一个大军区，有六个被列入“借用力量”，还有好几个军和省军区，为什么偏偏揪住广州不放，我敢向全党、全国人民作保证，我不知道。

.....

毛泽东指着我说：“丁盛、刘兴元，你们俩个人，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你毛泽东说这话就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我们干什么工作又不是靠黄永胜起家的，这可以查。

我们当什么，是毛泽东你的命令，不是黄永胜的命令。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照样干革命工作吗？怎么能够这样说！我认为毛泽东当时对广州这个考虑是不公道的！你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密切，那你跟他的关系不密切啊？从井冈山你们一起下来，他当总长是我们让他当的吗？不是你们，你毛泽东叫他当的？丁盛、刘兴元有这个权力说：“黄永胜，你去当总参谋长”？是我们叫他当的？这不讲理嘛！那么，你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听指挥，那么我们怎么听指挥呀？他是对的，革命的，我们当然要听，那么以后你说他们不对了，是反革命了，我们就不听，这是界限嘛！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说我们，你怎么不讲你用错了人啊？强加在我们身上！“九一三”以后，打击多少人啊？

.....

我们广州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是绝对的忠实，忠诚！比如说冬天，北京没有蔬菜，由我们广州军区供应。

毛泽东当时喜欢吃什么呢？蔬菜嘛，我们这里是空心菜，玉米，我们在海南岛种些玉米，很嫩很嫩的玉米，还有其它的青菜。

饭，毛泽东喜欢吃麦片，麦片是澳大利亚的，我们从香港专门买的澳大利亚的麦片给毛泽东，送到北京去！从香港买麦片都不能过海关，通过海关他要检查，要打开来，那就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情报部有船，在香港买的麦片，装在船上开回来，开回来以后，直接交给管理局。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知道，负责保管的小胡知道，他看守着仓库。那么多麦片，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包，尝也没有尝过，我们也不知道那麦片怎么吃。

我们修的毛泽东的那个房子，为了他的安全，怕飞机轰炸，就在七号楼旁边，几公尺的地方，打一个穿山洞，大的坑道，坑道里面还有小房子，有飞机轰炸时，他在房子里面可以休息，还可以办公，很安全，如果不打原子弹，那绝对没问题。

周总理那套房子，他来了，睡了午觉，吃了饭，睡了一下。有一次我到北京，邓大姐给我讲：周总理在南方睡了个午觉，说那个房子很好，他很高兴，大姐给我讲：很安静，环境也好，周总理很高兴。毛主席没有来住过，康生没有来住过。只有周总理去过，董老，董必武去过，董老去休息过，李先念、华国锋去过，其它的没有，江青住过，江青在一号住过，松园她住过。

七〇年在北京开会期间，韦国清、刘兴元他们活动，要到江青那儿去照个像！江青过去也不认识我，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话。江青就答应了照个像，有韦国清、刘兴元、卜占亚、我，我们四个人，到她家里照个像，每人都照了。话嘛，没有什么说的，那时候我也不插话，我和她也不熟，她也不大认识我，我们也没说什么话，我记得好像在她家里吃了顿便饭。

我在广州军区工作这一段，小结一下。

我认为广州军区的领导和部队，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部队也好，个人也好，都是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壮大起来的！是经得起风雨，经得起考验的。林彪事件后，广州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广州军区这段工作，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做亏心事！广州的领导同志们没有做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谁都没有搞。我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我们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也不必要搞阴谋诡计，搞什么阴谋诡计啊！我们都是工作关系，上下级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就应当要好，上级说话不执行能行？毛泽东在长沙与我谈话，我们全部执行了，贯彻了，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北京，我就作检讨，总理讲：“你不要检讨了，你们思想检讨，检讨够了”。总理当面给我讲的。“你们九一三以后，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很满意，部队稳定，没有出事，当时北京跑出来五六个人，你们都把他们抓回来了，送到中央来了，很高兴，很好嘛！还作什么检讨”。总理就是这样给我讲的，“不要检讨，好好工作就行了”。

七三年十二月份，我们八个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接见我，毛泽东讲了：“你呢，实际上到广州也不久，也调换一下，你身体不大好”。毛泽东这样跟我讲，总理在跟前介绍的！谁谁谁，“噢，我知道！要注意身体”。我说：“主席，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办事！”

这样讲的，总理一个一个讲。所以，这一段，我们应该向党交待，广州军区绝对没有搞阴谋诡计，绝对没有事情。强加广州军区的，强加于哪一个人的，都是错误的。

◇ 南湖的房子是给谁修的？

一九七〇年，汪东兴讲，毛主席要到广州来过冬，也是一样的，要到广州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也得修房子，没地方住啊！省委的小岛一号有一个房子，感觉住那里也不够，小岛一号也不够，就要修，要找地方。我和刘兴元几个领导人又去找，广州那个城边上，我们找了个地方，麓湖边上，看了一下，不行，那个位置还是好的，但是太嘈杂。

有一次，我们的侦察部队在磨刀湖搞演习，搞潜水，我去看了，无意之中我就看到，这个位置不错，这个地方给中央领导修房子是好位置，周围是山，中间是水，叫磨刀湖。我和刘兴元高兴：这个位置可以了。我就问汪东兴：“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它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去过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你给我们讲个原则。”汪东兴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

这样不更好嘛，根据汪东兴的介绍，我们就派了具体办事情的三个人，一个是军区副参谋长刘如，一个是我们作战部的副部长王庆林，一个是后勤营房部副部长邹和典，他们三个人，负责修房子的具体工作。他们去看，把这两个地方都看了。我说你们去看看吧，把它的规格、大小、尺寸、长短、摆设，你们都把它记回来。这样，搞好了以后，我们就在七〇年的五月份，开工！现在那里叫南湖。

总的方面，我经常去管，更具体一点的，是我们一个副司令，江燮元，都去世了。办具体工作的就这几个人。因为很急，当时我们就调了两个团，修这个房子。

汪东兴在开工的过程中来了。汪东兴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修多少栋房子呢？汪东兴讲：主席一栋，总理一栋、康老一栋，就是康生，这个……江青一栋，这是这样，修这么多！

……

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汪主任，你在哪里住”？因为他是办公厅主任，他跟随着毛泽东哪！“你这么办！我最后跟着主席的工作人员，我和张耀祠”张耀祠也是办公厅的副主任哪！专门跟着主席的！“我们（汪东兴、张耀祠），还有医生、护士和其它的所有工作人员修一幢，我们住一块”。

……

我又问他：“总理、康生，这些房子我们都比较好定了，在哪个位置。江青的房子往哪儿修？”汪东兴怎么讲呢？他说：“江青的房子离主席也不能太远，太远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见”。这怎么好找啊？要看不见！哎呀，好费神啊，费力啊！走来走去，走了又走，看来找了那个地方，现在的南湖一号。原来是毛主席那儿叫一号，总理的叫三号，康生的叫五号，江青的房子，七号，后来为了保密，就倒过来了！江青的房子叫一号，康生的叫三号，总理的房子叫五号，主席的房子叫七号。

后来汪东兴又出题，说主席不能总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总住在这里啊？不能总住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再修一个地方呗！所以，后来“松园”那一幢，也是给主席修的！所以整个南湖的房子就是一、三、五、七、松园，汪东兴他们住在那个八号，全部按照这样修了。

修完以后汪东兴又来了，来看了一下差不多了。看了以后呢，他不大高兴，我们就知道了。意思是我在哪里住啊？本来汪东兴原来就讲了和张耀祠和主席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的，就是南湖的八号，房子都在，两套，还是很高级的。他不大高兴，没办法，不高兴嘛，那就给你再修一幢嘛！就是一号下来水上、水边那幢房子，是汪东兴的。为什么修在水边那个位置呢？就是隔毛主席近！别的还没有地方了！好，这下他就没什么说的啦！这是一次，他来了好多次。

……

这几个领导的房子，是汪东兴原则定的，具体规定的，具体检查的，我是完全按照汪东兴的意思来办的，按他的要求来做的，中央办公厅还有个局长姓毛，专管工程的，他也来过几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房子这是绝对可靠的事情，是汪东兴交给我的。在“九一三”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周总理，叶帅，整个花了六千多万元，他给批了这个钱。那个时候，松园这套没有完工，我说：“总理，那套没有完工怎么办呢？”他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



说：“就这样没有完工，那就害怕浪费了，没有用了，再加点钱把它修起来，今后还可以用！”总理就说：“好啊，你们就把工程结束吧！搞完吧！”这样，“松园”的房子是后来，“九一三”之后才完工的！修这个房子的全部过程就这样！

修起来了就要用，这个房子每一个大厅都要有一个放电影的坐机，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个电影坐机呀，汪东兴就讲，哈尔滨有，汪东兴的关系，从哈尔滨拿来四台坐机，主席的、总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每一个大厅有一台坐机。本来很明确，名正言顺地给他们修的，七四年“批林批孔”，广东的过去的那些造反派也好，其它的什么也好，就硬说这个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说是林彪准备南逃之后，他在这儿住的！这样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王庆林，作战部副部长，是很老的同志，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是修这个房子，硬说是给林彪修的，在这个情况下，广东就写信给汪东兴，你亲自坐镇，你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

汪东兴说话？他就不说，啊呀，批呀，要命地查呀，搞呀！七四年，批林批孔，伤害多少人啊，我说你汪东兴是个人吗？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主席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说：“这个房子，是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你们定的！”说：“不是给林彪修的！”不说话，使广州军区大部分人，相当一部分参加工程的人，很愤慨！我也很愤慨！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帐？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段，汪东兴是中央副主席的呀！“九一三”之后，汪东兴是“四人帮”之后的副主席，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的，是中办主任呀，那时毛泽东还在呀！你们不说话，把这边搞得灰溜溜的，检讨呀，追呀，查呀！当时七四年在广州批林批孔，许世友提出来，广东的刘、丁、任就是林彪的死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许世友在广州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查出来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一定要查出来，林彪南逃广州，广东领导人知道！翻箱倒柜，批林批孔是从三月份搞起的吧，三、四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七月底，搞乱了，瘫痪了，不可收拾。这个时候，主席、总理派韦国清到广州来收拾这个摊子，这个时候才讲：这个房子不是给林彪他们修的，这个房子给毛主席修的。好，这样才结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